

李亚平 于 海 编选

西方志愿工作及志愿组织论文选

第三域的兴起

Edited by Li Yaping & Yu Hai

第三域的兴起

——西方志愿工作及志愿组织论文选

李亚平 于海 编选

复旦大学出版社

第三域的兴起

——西方志愿工作及志愿组织理论文选

编 选 李亚平 于海

责任编辑 陈士强

责任校对 张利勇

装帧设计 吴珊丹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200433

86-21-65102941(发行部) 86-21-65642892(编辑部)

fupnet@fudan.edu.cn

经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刷 上海第二教育学院印刷厂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9

字数 150 千

版次 1998 年 11 月第一版 1998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 000

ISBN 7-309-02143-6/B·106

定价 15.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随时调换。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关于西方志愿运动和志愿组织的理论文选。文章选自近十年来英美学者讨论志愿组织的最新论著,作者多为该领域中的资深专家。西方志愿组织历史可追溯自教会的慈善传统,但蔚为大观而成为政府、市场之外一个独立的领域,则是本世纪70年代以来的格局。在本书中,赛拉蒙等学者提出和发挥了一个对把握当代志愿行动和志愿组织极富概括意义的范畴:第三域。相对于权威的国家领域(公域)和自身利益导向的市场领域(私域),非政府及非营利的志愿域(“第三域”)体现了自助、互助和助人的原则,体现了普通民众主动参与社区发展,自主解决社会问题的精神,提示了一种减少市场机制负面效果,超越国家机构官僚作风,增进人际和谐和社会向善的发展战略。第三域的理论,对于认识我国转型期的志愿团体的发育、发展及对社会结构变迁的深远影响同样具有启发和借鉴作用。配合“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发育一个既有自主活力又健康有序的公民社会,正是志愿运动所努力趋赴的社会目标。

目 录

为了共同的目标(编译说明)	李亚平(1)
第三域的兴起(代译序)	莱斯特·赛拉蒙(7)
非营利领域及其存在的原因	莱斯特·赛拉蒙(26)
未被开发的“域”	迈克·赫德森(41)
我们能界定志愿域吗?	托尼·马歇尔(73)
“志愿”概念对于志愿性和非营利 领域意味着什么	斯蒂芬·奥斯本(95)
志愿组织是否负有责任?	戴安娜·丽特(115)
志愿域的道德准则与管理	伊恩·泰勒(141)
影响志愿机构工作的基本要素	玛丽莲·泰勒(164)
美国混合经济福利模式中的 政府作用	莱斯特·赛拉蒙(185)
契约和服务	史蒂文·史密斯 迈克尔·利普斯基(200)
契约对志愿机构的作用	简·里维斯(227)
非营利组织与社区	史蒂文·史密斯 迈克尔·利普斯基(246)
译后记	于 海(279)

为了共同的目标

(编译说明)

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历史的进程,是一个系统的、不可逆转的过程。它反映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所经历的巨大变化。所谓社会现代化,是指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心理、知识和人口等各个领域的多方面的变化进程。此外,社会现代化还意味着:在社会生活方面,社会成员以城市的社会生活为主,以普遍的社会成就为行为的目标;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方面,以普遍的一视同仁的原则取代特殊的分别对待的原则。对于目前的发达国家来说,它基本上是一个自然演化的过程;对于后发展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它已成为各国领导人的一种自觉选择的目标。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引发生产关系和社会经济基础的变革,进而最终导致社会

上层建筑的变革。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必然要求政治的现代化,反过来,政治的现代化又将促进经济的现代化。回顾人类社会的历史,人们就会发现,每当生产力发展到一个关键的转折时期的时候,政府的职能就必然发生相应的改革。而凡在经济的发展面前主动进行改革的政府,都反过来推动了本国的经济发展,领导了世界历史的潮流。政府不主动改革,就会有别的力量来改革政府。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公共部门经济管理项目主任布莱恩·布罗根提出,重塑政府职能是世界各国政府和国际行政科学领域共同关注的问题。

21 世纪将是人类创造文明的辉煌时代,如何在新的世界即将到来之际,改革公共行政管理,重建政府的职能,是时代发展的趋势和要求。尽管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同,历史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发展道路不同,但政府职能改革的思路和目的有很多相同或相似之处,就是要弱化干预职能,增强综合协调功能,使政府的职能更适合公众利益。中国的公共行政改革是新旧世纪之交国际公共行政改革的一部分。因此,这项改革必然带有时代的特点和国际公共行政发展的共同趋势的烙印。按照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十五届二中全会的要求,国务院机构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高素质的专业化行政管理队

伍,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中国特色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在我国,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政府机构,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结合部。中国政府发展的重要依据是政府职能的变革。

精简国家机构的意义决不在于字面上的或形式上的裁减机构和削减冗员,其目的是在于彻底转变传统的治理国家的模式,迅速适应经济全球化浪潮的要求。政府行政改革是要使公共管理部门找到从传统的政府管理部门转化为现代劳务管理部门的道路。这意味着,公共管理在许多情况下要告别现行体制、严格等级制度和相应的官僚主义组织的传统结构等要素。我国在推进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已经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即许多政府部门退出后的职能由谁来承接?怎样推进我国社会的非营利社会服务志愿组织的发育成熟和与其相配套的社会公共机制?

在当今变化多端的社会环境中,非营利组织(域)的发展,是具有世界共性的社会演变趋势之一。这是由于在面临众多难以避免并且越来越尖锐化的社会问题时,人类逐步认识到,市场机制取代不了社区(Community)机制。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在经历 80 年代经济打击之后,福利多元主义引领各国走向私有化和市场化的趋势,这不仅提升了“第三域”(The Third Sec-

tor)——非营利社会服务志愿组织——的责任和地位,也意味着民间的参与在社会服务领域中已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世界上许多专家预言,在未来的年代里,非营利组织(域)的规模和重要性将不断增长,许多在过去三十到四十年间由政府承担的义务,将被社区组织——非营利组织(域)取代。事实上,“第三域”已经是当今世界范围内发展最快的一个领域。志愿服务原则作为一种社会主导原则,已经成为与市场原则和政府原则并列的三大原则之一。

在深化改革,推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我国正在倡导和推进以爱心助人、奉献社会为宗旨的志愿者活动,这既是继承中华民族互帮互助的优良传统,也是新时期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新举措。志愿工作或行动,是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配套的现代社会体制十分重要的方面,它以一定的社会价值观为基础,有理论依据和实践方式,是需要社会各方和众人投入及参与的一种持之以恒的社会行为。

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有其独特性,但是我们不否认人类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共性的东西。相反,应该积极吸取其他国家的经验和借鉴他们的教训,争取在可能的情况下加快我国现代化的进程。非营利社会服务志愿组织不仅可有效补充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中的内

在缺陷,而且在其运作过程中可推崇可被普遍接受的“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价值观。一个富有的社会,如果缺乏对人类充满终极关怀的人文精神,如果缺乏对社会批判力量的博大包容,缺乏对物质之外更深远的精神追求,这个社会是不可能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西方国家有一二百年的支援组织和运动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文献,其中不乏可供我们参考和借鉴的实践和理论的资源。本《文选》中的文章主要选自1988年以来英美国家有关志愿行动和志愿组织的最新文献,作者多为该领域中有影响的学者。他们的研究涉及志愿行为和志愿组织的历史背景,基本理论界定,行为和组织分析,以及与志愿活动有关的一系列关系和问题。

《文选》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的五篇文章论述了志愿(非营利)组织的历史背景、定义、性质、功能和作用;第二部分包括了有关志愿组织的道德准则及管理的三篇文章;第三部分的四篇文章,阐述了志愿组织和政府的关系,特别是分析了福利国家在对非营利组织提供资助中,政府和志愿组织间的契约关系(Contract Culture)。

参加《文选》编译工作的有复旦大学的于海、孙中欣、徐珂、陶友兰及中华YMCA全国协会的金蔚、王承

思和陈崇德。我们要感谢复旦大学出版社的高若海先生、夏德元先生,支持出版这样一本专讲“无私奉献”,无利可图的《文选》,不但要有学识的眼力,更需有奉献的精神。

本书所选之文章,已得到原著出版公司或原著作者的授权。其中,由美国麦克米兰公司出版的 *Voluntary Agencies: Challenges of Organisation and Management* 一书中所选四篇文章的中文版权为有偿转让,余皆为原著作者无偿授权。这些作者或在大学任教,或在非营利组织中担任要职,都在志愿域的研究和实践方面卓然有成。在此,我们谨向 Mike Hudson 教授, Michael Lipsky 教授及 Steven Rathgeb Smith 教授致以由衷的感谢。他们对本《文选》的支持,身体力行了他们为之趋赴的事业的真精神。

有为《文选》作出过努力的人都希望,我们的工作能为有关决策者、研究者和具体工作者,提供一些有用的帮助,使大家关心我国的志愿工作,并能就此课题进行讨论。建立有中国特点的志愿工作理论和实践,促进我国志愿工作的发展,是所有我们这些人的共同心愿。

李亚平

一九九八年七月

第三域的兴起^{*}

(代译序)

莱斯特·赛拉蒙(Lester Salamon)

席卷全球的“团体革命”

一场有组织的志愿运动和创建各种私人的、非营利的及非政府的组织的运动,正成为席卷全球的最引人瞩目的运动。从北美、欧亚的发达国家到非洲、拉美和前苏联集团的发展中社会,民众正在创建各种团体、基金会和类似组织,去提供人道服务,促进基层社会经济发展,防止环境退化,保障公民权利,以及成百上千先前无人关注的或由国家承担的种种目标。

* 原文刊美国 Foreign Affairs, 1994 年 7/8 月号。

这场运动的范围极其广泛。的确,我们正处在一个全球的“团体革命”(Associational Revolution)中,它也许终将证明,它对 20 世纪晚期的意义,如同民族国家的兴起对 19 世纪晚期的意义一样重大。其结果是形成了一个遍及全球的第三领域(Global Third Sector):大批自主的私人组织,不再热衷于为其股东或经理孜孜逐利,而是致力于国家正式机制以外的公共目标。这些团体的盛行可能长久地改变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其产生的影响也将超出它们提供的物质性服务本身的范围。几乎所有美国重要的社会运动,如民权运动,环境保护,消费者运动,妇女或保守派等,都扎根于非营利领域中。这一现象的增长确实引人注目,因为与此同时发生的是像选举、政党、工会这些更加传统的政治参与形式正逐渐衰落。

第三领域的兴起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包括公民个人,民间机构,以及政府本身。它反映了某些独特的社会变革及技术变革,以及公众长久来积累的对国家能力的信任危机。广泛的历史变革业已为能更有效地解决人类需要的新型机构开辟了途径。凭着其规模小、灵活,并善于从底层调动积极性的特点,这种私人的非营利组织已经十分适合来填补现代社会产生的种种鸿沟。结果导致了一场十分接近于亨廷顿所认为的民主

政治革命的“第三次浪潮”的彻底变革进程,但其影响范围更大,它同样影响民主体制和权威体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人人参与

非营利组织之庞杂多样令人难以置信,分析其在全球范围的迅速发展并非易事。缺少系统的资料,术语意涵的多变,以及各各相异的功能,使得我们难以对这些组织逐一地加以辨认。困难的定义问题还混合了由于各国法律结构的不同而对这些组织的不同对待,一些国家明确地以慈善性质或非营利性质定义这些组织,另一些国家则区别为慈善组织和非营利组织,还有的国家则完全另有一套规定,官方公布的这类组织自然极不完整,国家经济统计表对它们的处理也很草率。

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也妨碍人们清楚地考量非营利领域的真实范围和作用。过去 50 年间,左派和右派人士都看轻这类组织。左派这样做旨在证明扩大福利国家的合理性;右派则试图证明,批评国家是私人“中间机构”的破坏者是有道理的。福利国家的兴起,使无论公众舆论,还是学者研究,都排挤非营利组织,即便这一领域事实上正在持续地增长。

假定这些问题都存在,我们便难以确定今日蔚为大观的非营利组织运动是一场崭新的运动,或者不过是久遭忽视的领域的重新发现。但第三领域组织在世界范围内的最新的蓬勃发展是无庸置疑的。在发达国家,近几十年公民行动主义(citizen activism)的影响日益扩大。1982年对16个美国社区的非牟利服务组织的调查表明65%的组织是1960年以来建立的。私人团体在法国出现同样迅速增长的势头,仅1987年一年就建立了54 000个,与之相比,60年代每年的数目是11 000个。据最新的估计,英国有慈善组织275 000个,收入接近国民总产值5%。在意大利,1985年所做的一项研究显示,40%的这类组织建立于1977年以后。

发展中国家的非营利组织的发展甚至更为强劲,目前就有4 600个西方志愿组织积极帮助大约20 000个当地的非政府组织。在印度,起源于甘地传统的乡村觉醒运动(Village Awaken Movement)活跃于数千个村寨。孟加拉国一下子成立了上万个注册的非政府组织。在斯里兰卡,Sarvodaya Shramadana运动组织了逾8 000个的村庄去建设小规模的生产改进项目。在菲律宾已经成立了21 000个非营利组织;以地方行动小组为基础建立起来的100 000个Christian Base Communities如今遍布巴西乡村;据报告,非营利组织在智利

有 27 000 个,在阿根廷有 2 000 个;最近的估计认为,肯尼亚首都 70 年代以来 30%的发展项目来自 Harambee 运动,这场运动导致了地方社区开发了范围广泛的发展项目。

同样的发展在东欧和前苏联也很明显。在全球瞩目的 1989 年政治事变前,意义重大的变革已在东欧社会内发生,志愿组织恰恰处在这一变革的中心位置上。名副其实的“第二社会”实已存在,民众的网络联系了成千上万、甚至上百万的人,他们互相帮助,对付困扰他们的经济短缺问题。至 70 年代末,这些民间网络业已获得政治上的重要性。

1989 年政治事变后,这一过程加速进行。1992 年,波兰数千个基金组织获政府机构批准。在匈牙利,1992 年有 6 000 个基金会和 11 000 个团体注册登记。成立于 1991 年的保加利亚基金会论坛与新创建的 30 个私人团体有着密切联系。尽管这类发展在前苏联较为缓慢,但近来也加快了进程。1986 年成立了社会创新基金会,组织的宗旨在于将公民的创意转化为有效的社会行动。自那时起,数十个别的基金会和非营利组织相继创建,或帮助有才能的儿童,或抗议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或唤起公众注意咸海的消失,或推动文化多样性,以及为其他数十种其他的目标而工作。

推动志愿参与的压力

我们如何解释上述现象？促进志愿领域发展的压力看来至少有三个不同来源：来自基层的主动积极的热衷者(beloved)，来自体制外(outside)的从事志愿活动的各种公共的和私人的机构；自上而下(above)的政府政策。

最基本的力量是决心自己动手来解决问题，自己组织起来改善境况或争取基本权益的普通民众。前苏联、东欧的情况是一佳例。那里的活动积极分子称他们的努力旨在创建一个个人不仅有权说话而且有权利自己进行组织的“市民社会”。共产主义时代发展出来的庞大的互助网络，为新时代的民主热忱提供了条件。正如一位匈牙利活动家所说，“40年来我们第一次担负起对我们自己生活的责任。”

同样的压力也见于第三世界。据报道，街坊改善协会在拉美 20 000 多个公屋居住区的大部分地区扎下根。此外，合作组织、妇女团体、行业和物业协会及互助团体在过去 20 年间迅速发展。例如，一个印度的环境运动，CHIPKO，在村民的拯救濒危森林的共同努力下中形成了，他们围着树手拉手，向社会宣示保护环境